

# 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性转型

田 刚

68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对中国文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8年后的今天,我们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延安文艺研究中心,并召开了延安文艺研究的座谈会。60年,在时间上讲也许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则具有特殊的意义。60年,在古人是一甲子;从版权法的角度,个人著作权也出离了保护的范畴;从档案学的立场,60年许多历史档案也到了公开的时候了。因此,在延安文艺发生的60年之后我们来探讨延安文艺研究,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今天我们的座谈会,是老、中、青济济一堂,文、音、美,三体合一。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座谈了对延安文艺研究的看法。综括我们座谈会的发言,同时也借鉴近年来延安文艺研究的最新动向,我认为延安文艺研究在新世纪十年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这一历史转型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化的趋向。历史学的目的在于求真,但实际上,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尤其是当代历史时做到真正的“求真”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许多历史当事人还活着,还纠缠在历史诸多利益和是非之中。所以古人云“盖棺定论”,当代不宜写史。以前我们对于延安历史的叙述,多是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进行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决策,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叙事。但时过境迁,许多重大敏感的历史事件也基本尘埃落定,这时候历史学的“求真”性能越来越发挥作用。近年来在近现代历史学领域,随着一批关于延安社会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的问世,如何方先生的《党史笔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这一历史化的趋向渐趋明朗。在延安文艺研究方面,在座的王培元、朱鸿召、袁盛勇等先生,还有延安大学的高杰先生、中山大学的吴敏先生等,在这一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工作。可以预见,随着诸多延安时期历史资料的披露,许多历史的面目将会更加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文化学的趋向。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历史,因为人类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更是

一种文化的动物。以往我们关于延安历史文化的研究,强调的还是其“党史”的性质。“党史”在某种意义上主要还是政治、军事的历史。即使是“延安文艺”这一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的历史活动,也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大原则下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的烙印。具体到延安文艺研究而言,更突显的还是其“政治”的性质,文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贯彻政治决策或形象演绎政治理念的传声筒。这实际上意味着延安文艺研究“文艺性”的丧失。新世纪以来,这一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受到研究者的普遍质疑,延安社会历史的“文化性”得以突显。我们以往了解的延安历史,只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实际上更多的历史细节需要我们去描绘,更多的历史褶皱需要我们去填补。在这一方面,朱鸿召先生的近作《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工作。这本书从大量的历史档案中“钩沉”了大量的历史细节,进而来探讨延安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特质。延安时期历史和文化是异常丰富、复杂的,以文化的视野对之进行历史的观照,一个更加“立体”的延安将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现代性的趋向。我们党的“延安时期”,是一个伟大的特殊的时代。说其“伟大”,指的是我们党在延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取得了在全中国的胜利;说其“特殊”,是陕甘宁边区是在国民党封锁下的一个“特区”,这一“特区”在文化上总体上是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下存在的。即使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就是“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时非历史的态度”。可是以往我们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尤其是对“讲话”的态度,竟然把“讲话”奉为不可动摇的“法典”,稍有看法,就有被戴上政治帽子的危险。现在看来,这是不正常的。比如,现在我们还在流传一个名言:“凡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实际上这是似是而非的。女人裹脚,男人梳辫,曾经是我们民族的“国粹”,但能是“世界的”吗?即使是一个民族的“国粹”,如果其不符合人类的普世价值,其也很难是“世界的”。新世纪十年,这一把延安的社会

历史无限“圣化”的倾向,把“讲话”奉为“圣经”的态度,逐渐得以改变。研究者主体自身的“反省”态度和拉开距离的“历史化”立场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这一研究态度的转变还要归功于研究者自身的“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这一视野使得我们的研究者能够从国际共运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中来观照延安时期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延安文艺的思

潮。可以预见,在这一“国际化”的历史视野下,延安文艺的研究将会结出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上述的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三大态势,实际上所指的是“学术化”的趋向,这意味着我们对延安文艺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 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延安文艺”

梁向阳

我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王瑶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观点:“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即使“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这就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的重视”(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王瑶全集·卷五》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是的,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我以为就研究“延安文艺”而言,也完全可以借助历史的方法来开展。

首先,要用整体观与系统观的观念来研究“延安文艺”现象。史学的观点,既是整体的观点,也是系统的、全面的观点。“延安文艺”说白了是“延安时期”的文艺现象,它的生成过程是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不熟悉中共党史,不了解“延安时期”的中共政策、方针,是很难认识清楚“延安文艺”现象的。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本身就是国际、国内多种外力与内力相互挤压、碰撞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肩挑民族大义,以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核心,既坚决抵御外寇的入侵,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试验。在“延安时期”所发生的文艺现象,自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关系密切。譬如,“延安鲁艺”的建立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密切相关;抗战之初全国各地大量青年作家纷纷涌入延安,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是与其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相关联;“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与“延安整风”相关联……等等。如果认识不搞清楚这些关联性,仅仅是局部的、就事论事式的“延安文艺”研究,往往会陷于具体事项的泥淖,导致“不识庐山真面目”情况的出现。因

此,我们不妨从外围切入,从事物的关联性入手,从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入手,用整体与系统的研究观念,来把握“延安文艺”现象。

其次,要认真把握“延安文艺”生成的历史场域,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用学理事实来说话。“延安文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远非我们后人能够想象,在逼近历史场域时,研究者一定要小心翼翼地逐层剥离其斑驳陆离的外表,从而触摸“延安文艺”的核心状态。举个例子,“延安时期作家”有“以革命者的名义进入延安的著名作家”、“对革命向往而进入延安的作家”、“延安时期机关、部队等地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等等类型,他们在身份上首先是革命战士,其次才是作家、艺术家。但这些作家是为什么要进入延安、如何进入延安、在延安的文艺活动(包括文学创作)怎样,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担任的社会角色怎样等等,这一切均需要追根溯源式的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分类与归类。目前,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认识,“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作为“延安文艺”现象生成的主体,延安时期作家是怎样被改造、怎样被心甘情愿地改造,又怎样在其文学活动与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又形成了怎样的传统,直至影响到建国以后的文学活动,这一切均需要用事实来说话。再如,“延安抢救运动”期间众多外来知识分子的“被抢救”后,在作家、艺术家心灵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迹,又是怎样呈现的,这也需要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想当然的臆测。史学的观点,是实证的观点。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搜集诸如当时的报刊杂志、个人档案、作家日记、回忆录、传记等这样一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扎实的“知识考古”。研究者谁在第一手资料的占有以及甄别上下足笨功夫、苦功夫,真